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地緣政治以及國際經濟等層面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爭議，中國的概念定義與實質內涵成為人文社會科學學界、乃至當代思想界關鍵的探討課題。究竟「中國」在概念意義上的範圍為何？其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與文化脈絡是否有所延續？抑或是有何發展及差異？對於以上問題，近年來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經濟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紛紛就自身學科的专业背景提出各自見解進行討論。至於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政治學家寫給所有人的中國史》，則是從政治思想的視野切入，以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迭為經，政治體制、秩序建構以及身分認同等議題作緯，藉此探討「中國」在思想意義上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本書英文原版由英國的政體出版社（Polity Press）於二〇一七年底發行，原題為《中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作者金英敏（Kim, Youngmin）現任韓國首爾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思想史、政治史與政治學，尤其在儒學與中韓政治思想史相關議題上用力尤多。作者二〇〇二年自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期間師從新儒家代表學者杜維明，學位論文題目為「重新定義自

我與世界之關係：明中葉新儒學論述研究」（*Redefining the self's relation to the world: A study of mid-Ming neo-Confucian discourse*），此外作者亦曾在歷史學、政治學以及哲學領域之學術期刊上發表中韓思想史相關議題之論文多篇，如其對明代理學家湛若水（一四六六—一五六〇）的思想曾進行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

根據本書〈導論〉及其英文原名，可以得知作者的寫作動機，曾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蕭公權的經典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啟發。在前人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基礎上，作者試圖在歷史書寫乃至史觀詮釋上，有所發覆。本書以長時段通史維度書寫中國政治思想的同時，亦強調超越國族主義史觀的一元論述。受到十九世紀歐洲國族主義以及實證史學思想的影響，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學界出現了一批中國通史類著作，其中膾炙人口者，諸如錢穆《國史大綱》、張蔭麟《中國史綱》、呂思勉《中國通史》等。這類通史著作，當中傑出者富有宏觀史識，尤貴考察歷史之延續與嬗遞，然而其中一元論的正統敘事，卻也往往容易造成讀者將所謂中國視為單一均質的整體，尤其是將漢文化以及儒家思想視為中國的主要範疇。

然而近年來隨著國際學界對中國研究的推進，尤其是對中國性（Chineseness）多元複雜內涵的揭示，學者們越來越傾向將中國視為一組在地理疆域、乃至文化範疇上持續變化而浮動的概念。更具體地來說，所謂中國的構成，並不只有漢文化，亦包含經由內陸亞洲（Inner Asia）與海洋世界傳入的非漢文明；另一方面，即便就漢文化抑或是儒家思想本身而言，其內部亦具有高度異質性而不可一概而論。是以本書雖以書寫中國政治思想為綱，卻不以目的論式的敘事強調政治思想對於中國大一統局面的延續性影響，而更加側重中國政治思想的內在多元性。

本書作者雖強調思想的內在多元，卻並非消極的解構論者。通過歸結中國歷代思想家對政治秩序的理念與論述，本書在〈導論〉及〈結語〉之外，依時序從先秦至晚清分別以八章的篇幅討論：文明禮俗社會（enlightened customary communi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國家／政府（state）、貴族社會（aristocratic society）、形上共和國（metaphysical republic）、獨裁體制（autocracy）、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治有機體（body politic）以及帝國（empire）等政治概念。綜觀各章篇幅、內容深淺不一，大體而言深入淺出，其主要特長在於綜合以歐美為主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以及問題意識，分析中國歷代政治思想特色及其變遷。作者係研究明代新儒學出身，故本書探討宋明理學與中國政治思想之相關章節較為出色，而其篇幅與論述相對精煉，可資中國思想史的入門者作為參考。作者在關注儒家思想內在理路的同时，亦能留意對外關係對於中國政治思想之深遠影響，尤其是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等非漢文化傳統，對宋代以降中國的華夷觀乃至大一統思想的互動。

通過探討中國歷代政治思想之發展與差異，本書批判性地檢視傳統中國的政治話語。不因循前人之說，作者主張所謂大一統的論述，實際上是建構在高度異質的多元因素之上，至於中國專制政體的形塑過程，亦不乏歷史的偶然性，並非是大一統思想必然導致的結果。在這個脈絡之下，就史學的討論概念而言，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與作為身分認同的中華，實際上並不完全重合，甚至有所矛盾，如作者在〈結語〉中列舉朝鮮在面對清朝的外部壓力時，內部以「小中華」自居的特殊認同，便是典型的例子。關於中華認同或者文化中國的多元性，正體現當代中共政權實際上並不同甚至無法代表文化意義上的中華。當代史學大師余英時

（一九三〇—二〇二一）曾用德國文學家保羅·托馬斯·曼（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之語稱「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誠哉斯言。